
中文善本古籍流转沿革：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所藏中文善本古籍为例

Chinese *Books on the Move—Rare Chinese Collect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译者姓名：金新秀（Jin Xinxiu），杭州图书馆专题文献中心，杭州，中国



This is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ooks on the Move—Rare Chinese Collect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opyright © 2013 by **Jin Xinxiu**. This work is made available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3.0 Unported License:

摘要：本文概述了中国蒲坂藏书和庞镜塘藏书，探讨它们在中国的形成、历经劫难却得以幸存，以及最终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收购等情况，论述了这些藏书在加拿大的继续流转情况。这些藏书最初为中国宦官、士大夫家族所收藏，蕴含着罕见、独特的文献资料。蒲坂藏书有 45000 册，最能代表广州与中国南部的文化。庞镜塘藏书源于山东省，和中国北方著名学者关系密切。我们梳理出这些藏书的流转情况：零散的文献逐渐聚集构成藏书；从战乱的中国流落到加拿大；最近从 UBC 亚洲图书馆移入 UBC 善本特藏库，最终，计划以数字化的形式重回故土。一直以来，我们在考察这些藏书的核心部分，以及它们作为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和情感价值。同时，阐明了影响藏书保护和利用的各种问题，此外，还介绍了 UBC 与中国机构在古籍保护和数字化方面的联系。

关键词：中文善本古籍、南州书楼、蒲坂、庞镜塘、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

中文善本古籍流转沿革：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所藏中文善本古籍为例

刘静（加拿大 温哥华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

布雷格曼·阿尔万（加拿大 温哥华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技术服务部）

摘要：本文概述了中国蒲坂藏书和庞镜塘藏书，探讨它们在中国的形成、历经劫难却得以幸存，以及最终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收购等情况，论述了这些藏书在加拿大的继续流转情况。这些藏书最初为中国官宦、士大夫家族所收藏，蕴含着罕见、独特的文献资料。蒲坂藏书有 45000 册，最能代表广州与中国南部的文化。庞镜塘藏书源于山东省，和中国北方著名学者关系密切。我们梳理出这些藏书的流转情况：零散的文献逐渐聚集构成藏书；从战乱的中国流落到加拿大；最近从 UBC 亚洲图书馆移入 UBC 善本特藏库，最终，计划以数字化的形式重回故土。一直以来，我们在考察这些藏书的核心部分，以及它们作为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和情感价值。同时，阐明了影响藏书保护和利用的各种问题，此外，还介绍了 UBC 与中国机构在古籍保护和数字化方面的联系。

关键词：中文善本古籍、南州书楼、蒲坂、庞镜塘、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

最近的目录学研究探讨了一些西方书籍和藏书的历史、流转与命运。^①我们建议对现存加拿大的两批中文善本古籍予以同样的关注。本文概述了中国蒲坂藏书和庞镜塘藏书，探讨它们在中国的形成、历经劫难却得以幸存，以及最终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收购等情况，以及这些藏书在加拿大的继续流通、转移情况。这些藏书最初为中国官宦、士大夫家族所收藏，蕴含着罕见、独特的文献资料。蒲坂藏书有 45000 册，最能代表广州与中国南部的文化。庞镜塘藏书源于山东省，和中国北方著名学者关系密切。1959 年，UBC 在澳门购得蒲坂藏书，而在此之前蒲坂藏书已有相当一部分流散。2000 年，方志豪（Paul Fang）在温哥华将数量少但不乏精品的庞镜塘藏书，赠送给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我们对这些藏书的流转情况进行了梳理：零散的文献逐渐聚集构成藏书；从战乱的中国流落到加拿大；最近从 UBC 亚洲图书馆移入 UBC 善本特藏库，最终，计划以数字化的形式重回故土。

^① 参见：Robin Myers, Michael Harris and Giles Mandelbrote: *Books on the Move: Tracking Copies through Collections and the Book Trade*, New Castle, DE and London: Oak Knoll and The British Library, 2007.

综述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图书馆收藏的 6 万册古籍中，有两批特殊的藏书，数量约有 45000 册。在战乱时期，藏书家们把这两批藏书从中国大陆分别运往了澳门和台湾。50 年前，这些藏书最终被移至加拿大。1959 年，UBC 从澳门显赫的姚氏家族手中购得蒲坂书楼，使 UBC 亚洲图书馆成为北美汉学研究的重镇。在此之前，仅有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伯克利分校、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收藏有最珍贵的中国藏书。蒲坂书楼计有古籍 3000 余种，约 45000 册，涵盖文学、历史以及从 12 世纪到 20 世纪初的思想等内容。这些藏书包括稿钞本、当地历史、文学著作、拓片、以及岭南、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歌谣和地图。许多古籍为南州书楼旧藏，而南州书楼是当时中国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除中国的图书馆以外，像 UBC 一样如此大规模地购买一个完整的中国私人藏书楼，是相当罕见的。

蒲坂藏书有近 2000 种清代学者的文学作品，其中约有善本 1000 种、而善本中又有孤本 100 种。这些藏书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因为能够刊刻出版的清代文集数量非常有限，并且许多文集没有点校本。因此，除 UBC 之外的学者也经常前来查阅蒲坂书楼的文集，并且研究者们已经有了很多有趣的发现。

庞镜塘藏书最初为山东庞氏家族所拥有，2000 年，方志豪宣布将这些藏书捐赠给 UBC 图书馆；2010 年春天，这些藏书正式移交 UBC 图书馆。这些藏书共 94 种 823 册，包括一些罕见的文学和书法作品，尤其以山东籍作家的作品居多。庞氏藏书包括很多善本、孤本，其中善本有 30 种。庞氏家族最初从海源阁搜集到许多善本、孤本，海源阁是中国著名的私人藏书楼，由杨氏家族 1840 年在山东聊城设立。

蒲坂藏书的流转情况

这两批来自中国南方和北方的特殊藏书，聚集了遍布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历史、文学和艺术珍品。它们目前已进入公共领域，在 UBC 拥有共同的家和命运。这些藏书的流转一直受经济和环境因素影响，尤其与 20 世纪初中国动荡的历史有关。

通过藏书章、题跋识语和购书记录，可以看出这些藏书流转的规模和复杂性。蒲坂书楼的大部分藏书源于南州书楼，而南州书楼是徐信符的藏书楼。徐信符（1879—1948），又名徐绍桀，著名学者、教育家。他曾在十几所学校中任教，这些学校多是一些现代高校的前身，其中包括岭南大学和后来的中山大学。他的许多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学者或政府官员，20 世纪 20 年代，他曾在广东省立图书馆工作。据徐信符的《广东藏书纪事诗》^②记载，当时广东约有 51 个重要的私人藏书楼，而他自己的南州书楼位居前五名。更值得注意的是，徐氏是一个学者，收入中等，而当时其他大多数的藏书家，均来自从事国际贸易、盐业、西药等行

^② 徐绍桀：《广东藏书纪事诗》，香港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

业的富有家族。

徐信符从 1900 年开始收藏图书。辛亥革命之后，动乱不断，广东的许多私人藏书楼倒闭，藏书纷纷散出，书籍价格便宜，徐信符趁机搜罗荟萃，家中藏书日丰。他不仅在当地购买了大量典籍，而且还在全国各地书坊购书。徐氏没有一部比较完备的藏书目录，因此不能确知他的藏书规模。关于南州书楼的藏书量，他的学生和朋友们给出了不同的数字。比较合理的估计是，1932 年他的藏书已达 60 万卷。当时南州书楼由两座二层楼房组成，共有 6 个房间，其中包括一个阅览室。^③

杜定友^④曾说，广东私人藏书，不出三代。南州书楼的聚散应验了这句话。南州书楼形成于中华帝国晚期，历经民国、抗日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在三代之内，南州书楼藏书烟消云散。自然灾害也是导致南州书楼藏书散失的原因之一：在一个漫长的雨季中，南州书楼的一座楼房倾塌，徐信符在这场洪水中损毁典籍逾 400 箱。



图 1：徐信符（1879-1948），名绍桀，字信符，以字行于世。

图片由广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倪俊明先生提供。

1937 年 8 月 31 日，日本轰炸广州，迫使徐信符携部分典籍举家迁至香港。到香港后，

^③ 高炳礼：《“南州书楼”聚散史述略》，《图书馆论坛》，2003 年 12 月第 6 期。

^④ 徐信符：《广东藏书纪略》，《广东文化论丛》，广东省立图书馆 1949 年版。

为维持生计，徐氏开始卖书。1941年香港沦陷前夕，徐信符挑选出部分善本，打算将其运往澳门，但是这批善本的具体书目不得而知。之后，徐氏迁回广州，在广州期间，徐氏病重，继续出让了更多的典籍。徐氏决心远离日本统治，待其身体好转后，再次举家迁至澳门。徐氏全家避难澳门后，其存广州寓所之书，大部分被劫掠、丢失。为维持生计，徐家出售了更多的书，包括从家中带出来的善本和寄存在香港的典籍。最终，徐氏在澳门将南州书楼藏书的精华卖给了姚钧石，具体情况我们将在下面讨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徐信符回到家乡。他计划将劫后存书整理编目，并将寄存在香港和澳门的藏书运回广州。不过事未竟，徐氏于1948年10月30日因心脏病发作辞世。

徐信符去世后，其子女将家中藏书出让给徐氏曾经工作过的广东省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这两家图书馆加上 UBC，持有原南州书楼的大部分藏书。1982年5月21日，徐氏孙女将南州书楼最后的藏书卖给了广东省图书馆。

姚钧石，广州人，成功的医生、商人和慈善家。姚氏通过购买徐氏数千册典籍，设法重建自己的私人藏书楼——蒲坂书楼。姚氏之所以给藏书楼取名为蒲坂书楼，是因为传说舜帝的祖先姓姚，而舜帝的都城建在蒲坂。和徐氏一样，为避战乱，姚氏也曾拼死将藏书从广州先后运至香港、澳门。遗憾的是，目前能找到的关于姚钧石的资料很少。^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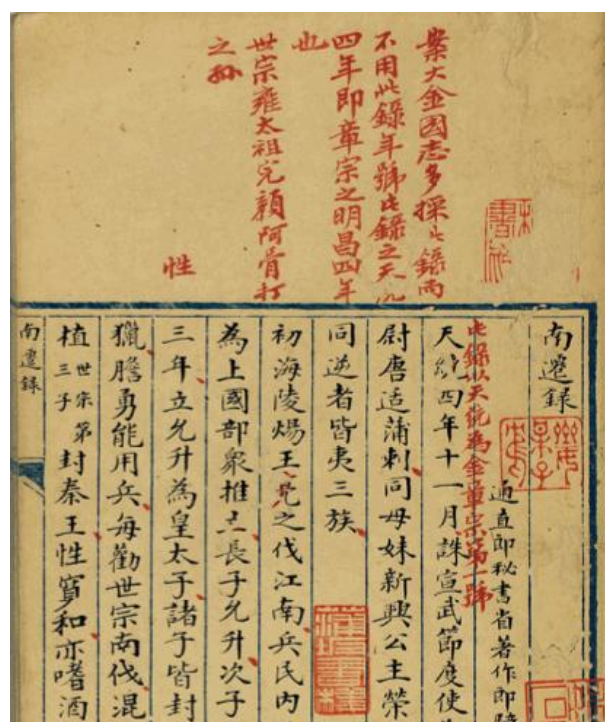


图 2：蒲坂藏书之一：《南迁录》，作者张师颜，内有多种藏书印章及识语。

历史学家何炳棣 1945 年离开中国，1948 年执教于 UBC，讲授汉学。1958 年，何炳棣代表 UBC 购买蒲坂藏书，并负责将其运至温哥华。蒲坂藏书是 UBC 的第一批中国古籍，

^⑤ 有关姚钧石的资料，来源于他的侄子姚殿敏（音译，Mr. Tienmin Yao）先生。姚殿敏是纽约的一名建筑师，他在 UBC 兴奋地发现了完整的蒲坂藏书，曾专门飞往温哥华参观那些曾经属于他们家族的隐藏的珍宝。

成为 UBC 亚洲图书馆的核心馆藏。UBC 亚洲图书馆成立于 1960 年，翌年，UBC 亚洲研究部随之成立。

庞镜塘藏书的流转情况

庞镜塘藏书主要是源自中国北方的典籍，最初收藏在山东，后运至台湾，最终保存在温哥华。这些藏书是由庞镜塘收藏并逐渐扩充的。庞镜塘（1900—1977），曾任中国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他从政之前是一位学者。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的妻子和 2 个女儿去了台湾。1948 年，他被解放军俘虏，后被判处劳动改造。在劳动改造的过程中，他曾受委托建立了一个监狱图书馆，并负责管理工作。1960 年，他被特赦释放，1977 年在沈阳去世。大部分庞氏藏书在战争中得以保存，最终流入中国大陆的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均藏有庞氏藏书。《菏泽市志》记载，庞氏曾向这些图书馆捐赠了 10000 余册书籍，除此之外，他还曾拿出自己的收入捐助村民。保存当地文化传统和回馈社会是庞氏家族长期以来的传统。庞镜塘的女儿庞祎女士是 UBC 亚洲研究专业的毕业生，她一直小心保存着他父亲藏书的精华部分，直至 2000 年去世。随后，庞祎女士的儿子方志豪联系 UBC 图书馆，向图书馆捐赠他们的传家宝——庞祎所存庞镜塘藏书。方志豪也是 UBC 的毕业生，现为温哥华的一名律师。

尽管庞镜塘藏书在数量上远远少于蒲坂藏书，但是它的研究价值却不容忽视。在这 94 种著作中，清初刻本占大多数，但明版、善本及孤本亦存在。这些藏书另外还有二十余件碑碣拓片和一些名人抄本。值得一提的是，《董其昌兰亭泥金写本》弥足珍贵。

在庞镜塘的藏书中有两通手札——《熊廷弼、杨涟手札》，极具价值。熊廷弼（1569—1625），曾任明朝辽东经略。杨涟（1571—1625），东林党领袖。熊廷弼和杨涟因得罪宦官魏忠贤（1568—1627），而被捕入狱，后均被处死。这两通手札迭经名家收藏，如晚清最有影响力的书法家何绍基（1799—1873）。目前关于这两通手札的背景和影响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⑥

庞氏藏书中有几部为孤本，如明遗民诗人闵鼎的《情话堂诗稿》，闵鼎的诗描绘了满族统治下汉族学者的生活现实。许多参考书著录其已散佚，庞氏所藏清抄本《情话堂诗稿》是目前所知现存的唯一一部。

⑥ 谷敏、刘静：《浅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所藏熊廷弼、杨涟手札二通》，《当代海外中国研究》第 1 辑，第 327—34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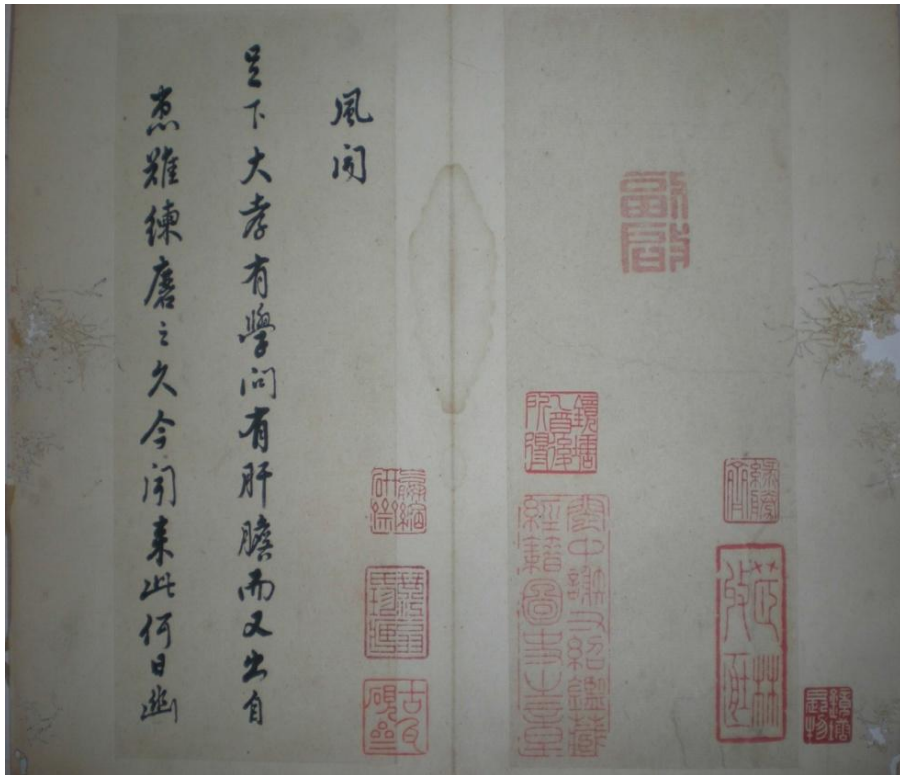


图 3：明熊廷弼（1569-1625）手札，庞镜塘藏书之一。

我们在初步调查庞镜塘藏书期间，发现了上述珍贵的古籍，但当时并未对庞镜塘藏书进行整理编目。我们在研究和整理这些藏书的过程中需要援助。例如，UBC 馆所藏《菘竹堂书目》，是一部非常有名的私家藏书目录，为作者叶盛后人所抄写。书中题跋和藏书印章反映了这部书的递藏源流，它似乎是独一无二的真本。然而，中国学者发现了这部书有伪本。我们不知道我们馆藏的手抄本《菘竹堂书目》是真本还是伪本。不管怎样，这个抄本是有趣的，不禁使人疑惑中国藏书史上伪书的地位和程度。

由这些藏书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涉及到一些用汉字繁体字书写但在朝鲜和日本刊刻的书籍。《古铜印谱举隅》是太田孝太郎编的一部古印印谱，它是在东京刊刻的。《奎章全韵：朝鲜正祖御定》，1974 年在朝鲜刊刻，是朝鲜一部重要的关于汉字变化的书籍。通过这些，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关于这些国家之间的图书贸易情况。^⑦

再次转移

直至今日，蒲坂藏书、庞镜塘藏书，以及其他日本、中国、朝鲜的善本古籍，均被保存在亚洲图书馆大楼的保险库内，其主体建筑建在三洋展览馆奇特的屋顶下。1970 年大阪展览结束后，这些藏书被运至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大楼因年岁已久需重修，然而在 2011 年重修时，屋顶漏水导致水流向了亚洲图书馆的保险库。因为这一问题未能及时发

^⑦ 参见：日本 Satoru Takeuchi 在 2006 年 8 月 18 日 IFLA 会前会“21 世纪东亚学术信息”上提交的论文“Early book paths as preface to library cooperation”。

现，引发了大规模的霉菌，甚至影响了整个保险库的藏书。400 多册书不得不转移至冷冻柜，等待进一步的保护，在 4 个多月的时间里，超过 60000 册书都被抽成真空，保持干净的状态，并被转移到其他藏书处。



图 4：UBC 亚洲图书馆

事实上，这一次紧急事件，让我们认识到，必须重视那些足以破坏古籍的“害虫”。在这批书到达 UBC 之前，它们曾经遭遇洪水、虫蛀，以及战乱中的打包与转移。在一段时间内，许多书的情况备受图书馆馆长和学者的关注。许多书的装订线断裂或脱落，一些树叶遭到虫蛀，另一些被撕裂或者脱落，以及另外人们可以想象出的关于旧书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一些罕见的版本原本就很脆弱，不容易处理。这部分藏书必须经过清洗，这对它们有非常大的好处。现在这些藏书大部分都经历了这一过程。虽然霉菌不能完全除去，但是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尽量减少损害，以便保留任何关于文献出处的信息。

当然，我们还会做更多的努力。我们已经对庞镜塘藏书进行了逐本保护评估，我们正在动用我们的整体能力，以维护和修复这些亚洲善本古籍。2011 年，布雷格曼·阿尔万在北京大学学习了三周中文善本古籍的传统保护方法。在这个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将会提升我们的保护设施和人员素质。目前，我们正在聘请一个管理员，我们的目标是确保亚洲及其他馆藏能够长期使用。

清洗之后，蒲坂藏书、庞镜塘藏书及其他善本古籍都被转移到拥有国家最先进设备的 UBC 古籍特藏库（RBSC）。我们希望这是蒲坂藏书和庞镜塘藏书的最后一次转移，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次。UBC 古籍特藏库一方面采取物理保护措施，并向本地读者开放，另一方面谢绝非本地读者使用。在新家里，这部分藏书将会和 UBC 图书馆的数字化设备做亲密接触。我们计划在完成所有善本古籍数字化的时候，将书籍内容放在数字化平台上，让书籍内容得到最大程度的公开，使全世界的学者都能共享这批资源。

该计划的一部分依赖于对脆弱树叶的额外保护，以避免处理、拍摄过程中带来的损害。例如，在扫描《大学衍义补》之前，我们需要做好相关的保护工作。《大学衍义补》可能是目前所存的唯一一部明弘治元年（1488）刊本，是 15 世纪论述治国之道的伟大著作。

数字化的另一个好处是将馆藏重新编目，以便适当的元数据能够和图像联系起来。许多蒲坂藏书的发现归功于我们的在线编目，但是大多数记录是非常简短的，不包含书目和文献

出处等信息，而这些信息的缺乏，不足以支持学术研究。因此，现有的记录需要和书籍内容相比对。例如，北京大学潘建国教授曾比堪 UBC 所藏的晚明小说家邓志谟的《楔音注竹溪蝉吟稿》，知 UBC 所藏刊本为邓志谟最早刊刻行世的诗集，刊刻时间应在 1606 年至 1607 年之间，此集是邓志谟收诗数量最大的一部诗文集。

另一个关于需要将馆藏重新比堪、重新编目的例子，是蒲坂藏书中的《朱次琦先生殿试卷》。朱次琦，19 世纪中期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他为其家乡南海县九江的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参与编写地方文献如文集、家谱、地方志等，更进一步帮助构建九江的地方认同感，因此，他又被称为朱九江。1847 年，朱次琦会试中试，成为贡士，从此进入仕途。根据我们的目录，蒲坂书楼的《朱次琦先生殿试卷》是作者的原稿，这份原稿是从紫禁城秘密带出来的。1930 年，朱次琦的学生简朝亮根据原稿重新誊录了一份，是为简朝亮抄本。普林斯顿大学对中国学者的研究非常有兴趣，他们最近的研究显示，尽管蒲坂书楼的抄本非常罕见，但它并不是作者的原稿。2006 年，朱次琦博物馆得到了一个来自香港私人捐赠的 1930 年的抄本，但是仍找不到原稿。

庞镜塘藏书目前尚未编目。一旦完成编目和数字化，这些藏书将会以虚拟化的形式重返故乡，并且可供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学者访问。在其他地方找到从藏书楼中散出的零散典籍，并将它们和现存的大宗藏书合起来，是很有可能的。尽管跨越了很长的时间和距离，一旦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至少可以了解到最早的藏书家们所做的努力。有了这些藏书，我们的馆藏步入了新的阶段，获得了新的生命，并将因它们的价值而不断得到提升。